# 才兼文武，学贯天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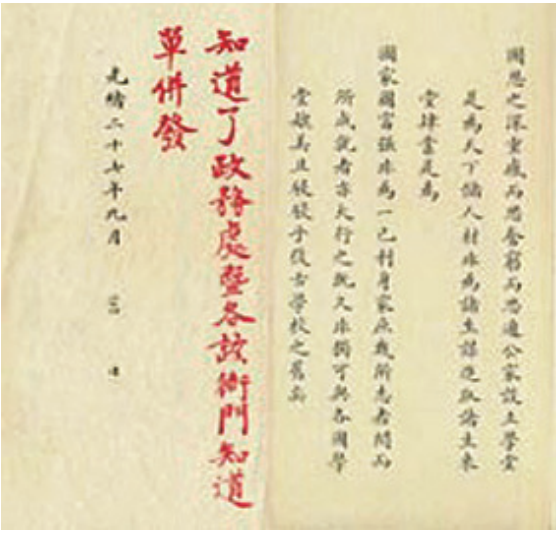
## ——纪念山东大学数学学科创始人黄际遇先生

东 青

今年是山东大学建校110周年，也是山东大学数学学科正式建立81周年——一个九九归一的年份。佛家往往将“九九归一”与“终成正果”联系起来，寓意一路探索而来，终于回到本初状态，从而大彻大悟。但对于一门基础学科而言，这种回归并不是单纯的“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感悟，而是历经艰辛、不懈追求，从而有所成就的一种升华。这是一个新的起点。

在这原点与新起点的交汇处，对创始者进行一下追忆似乎是人之常情，吾辈自不能免俗，然而更有一层原因是，作为山东大学数学学科创始人的黄际遇先生——一位擅数学、明经传、通骈文、工书法，乃至骑射、算卜、弈棋无一不精的才子型学者，长久以来竟然一直不为人所知。无怪乎与先生同乡的陈平原先生感叹：“此等人物，若生活在老北大，定然是校园里的绝佳风景。不知道是因为五十年代后专业化观念日益深入人心，凭兴趣读书讲学不再被认可，还是因教学于兵荒马乱之中，没有弟子承衣钵传薪火。”[1] 这也许只能算作其中的一个原因。另一重要原因窃以为在于先生对其学问的“低调处理”。先生所学广博，其诸多成果均付诸日记，“举凡科学、文学理论、筹算演证，与所作骈散文章，及与人来往书札、联语、棋谱，靡不笔之于篇。小楷端书间，杂以英、德、日诸国文字。月得一册。其在青岛所记者，曰《万年山中日记》，曰《不其山馆日记》。广州所记者，曰《因树

任初先生在山东大学，时年五十岁。（1935年摄于青岛）


知道了政務處暨各該衙門知道
單併發

光绪二十七年（1901 年）九月二十四日，时任山东巡抚袁世凯上《为遵旨该设学堂酌拟教规谨将试办章程缮单呈览》及《山东省城试办大学堂暂行章程》的奏折，皇帝照准奏称。红色文字为光绪皇帝于十月六日在奏折上的朱批：“知道了。政务处暨各该衙门知道，单併发。”

山馆日记》。在临武所记者，曰《山林之牢日记》。积数十年。”[2] 可惜的是，这些日记中的多半数失落于战乱辗转途中，而留下的正如蔡元培先生所言：“任初日记，苟付梨枣，非延多种专门学者，难与校对。”先生其人，正勃发之年而逝于乱世；先生其学，因少人传承而埋于故纸。由是，其名不显。然金玉岂可久没于泥淖之中？近闻潮汕文化研究中心正筹备出版先生日记，不胜欣喜，此宝贵文化遗产若可得见天日，后辈也可从中得窥先生风采之一二。

缘于上述，谨就所知，先行小文以记先生。

##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3]

黄际遇先生，生于清光绪十一年（1885 年），卒于民国三十四年（1945 年），字任初，后自号畴盦 [4]，广东省潮州市澄海县人。

任初先生一生行历丰富，因本文写作缘起于对先生创立山东大学数学学科的追忆，那么不妨先说说先生在山东大学的六年（1930-1936），这也是其治学生涯中颇值得浓墨重彩的地方。

山东大学始创于清末光绪二十七年，即公元 1901 年。时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上《为遵旨该设学堂酌拟教规谨将试办章程缮单呈览》及《山东试办大学堂暂行章程》的奏折，同时调蓬莱知县李于锴进行筹备。同年 10 月奏折获准，官立山东大学堂在济南泺源书院正式创立，周学熙任管理总办（校长）。这是继京师大学堂之后中国创办的第二所国立大学，也是山东大学历史的起点。此后山东大学历经波折，几近停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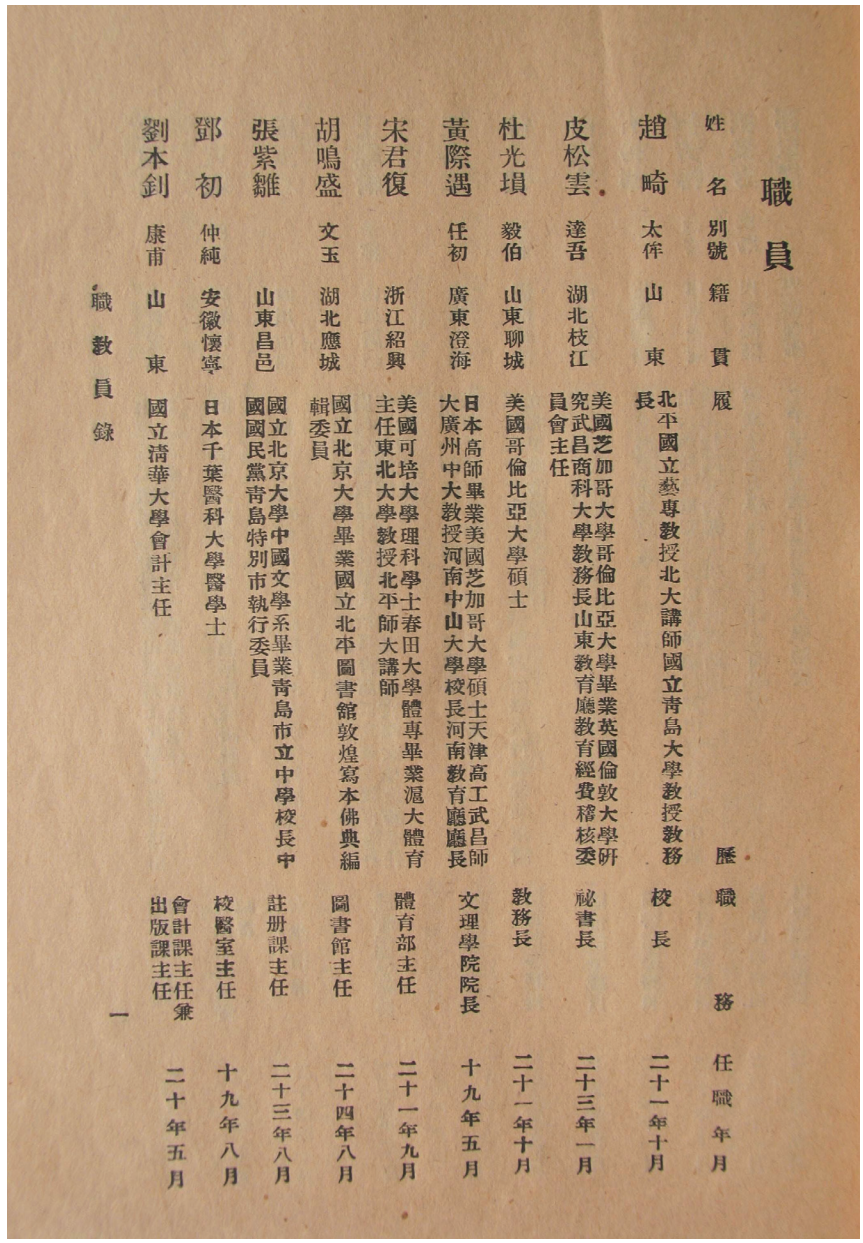
1930 年，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采纳蔡元培先生的建议，决定在原先私立青岛大学的基础上建立国立青岛大学。1930 年 9 月 21 日，国立青岛大学正式成立，由杨振声先生出任校长。他秉承蔡元培先生“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办学方针，广聘名师学者来校任教，以提高学校的学术水平，国立青岛大学理学院数学系也正是创建于此时，也就是现今山东大学数学学院的前身，其创立者正是任初先生。

据台湾版《山东文献》第六卷第二期的相关记载，作为第一批被聘任的教授，任初先生于 1929 年 12 月即赶赴青岛参与当时国立青岛大学的创制。学校成立之初，只有文学与理学两个学院，先生任理学院院长兼数学系主任，理学院下设数学系、物理学系、化学系、生物系。其中，物理学家蒋德寿、王恒守任物理系主任、化学家汤腾汉任化学系主任、生物学家曾省任生物系主任。

单从建制上看，刚成立的国立青岛大学似乎已初具规模，但在当时，师资短缺是国内高校普遍存在的问题，师资力量之困窘远非今天所能想象。数学系建系之初，开设了微积分、代数解析、立体几何解析、数学演习共 4 门课程 [5]，但任课教师只有任初先生一人，也就是说，国立青岛大学成立的第一年，整个数学系的教学完全是由任初先生一人完成的。面对此种窘境，1931 年国立青岛大学成立了由杨振声校长为主席的教师职称聘任委员会，任初先生为委员。尽管校方与

1930 年国立青岛大学建校原址（原为德占时期所建俾斯麦军营），校名为蔡元培先生亲笔题写，现为中国海洋大学鱼山校区

任初先生多方努力，第二年数学系也只聘到了一位讲师——宋智斋（字鸿哲），而且此人还是任初先生曾经的学生，来校任教一定程度上属于“友情支援”。随后的两年，数学系又陆续聘请了李先正、杨善基两位讲师。1932年，国立青岛大学更名为国立山东大学后，文学院与理学院合并为文理学院，下辖中国文学系、外国文学系、数学系、物理学系、化学系和生物系等六个系，任初先生为新成立的文理学院的院长仍兼任数学系主任。当时数学系教师尤其是教授奇缺的状况依然而没有太大的好转，这令任初先生心急如焚。任初先生听说他早年的学生曾炯（字炯之，1898-1940）正在德国哥廷根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于是便“预定”其学业完成后到山东大学任教，但毕竟远水难解近渴，曾炯便先推荐了同为留德学生且已获得博士学位回国的学友李达（字仲珩，1905-1998）。1934年8月，李达辞去清华大学教授的职位来到山东大学，成为数学系成立后聘请到的第二位教授，而这已经是山东大学数学系建立的第五个年头了。后来，任初先生又通过校方将自己兼任的数学系主任一职让给了李达。到1935年，任初先生邀请刚获得法国理学博士学位的陈传璋（字琰如，1903-1989）任山东大学数学系教授，李锐夫（原名李蕃，1903-1987）任讲师，从而使得当时的山东大学数学系具备了3位教授4位讲师的师资规模，仅看数字似乎并不惊人，但这与当时国内各高校数学系的师资力量相比已属名列前茅。



職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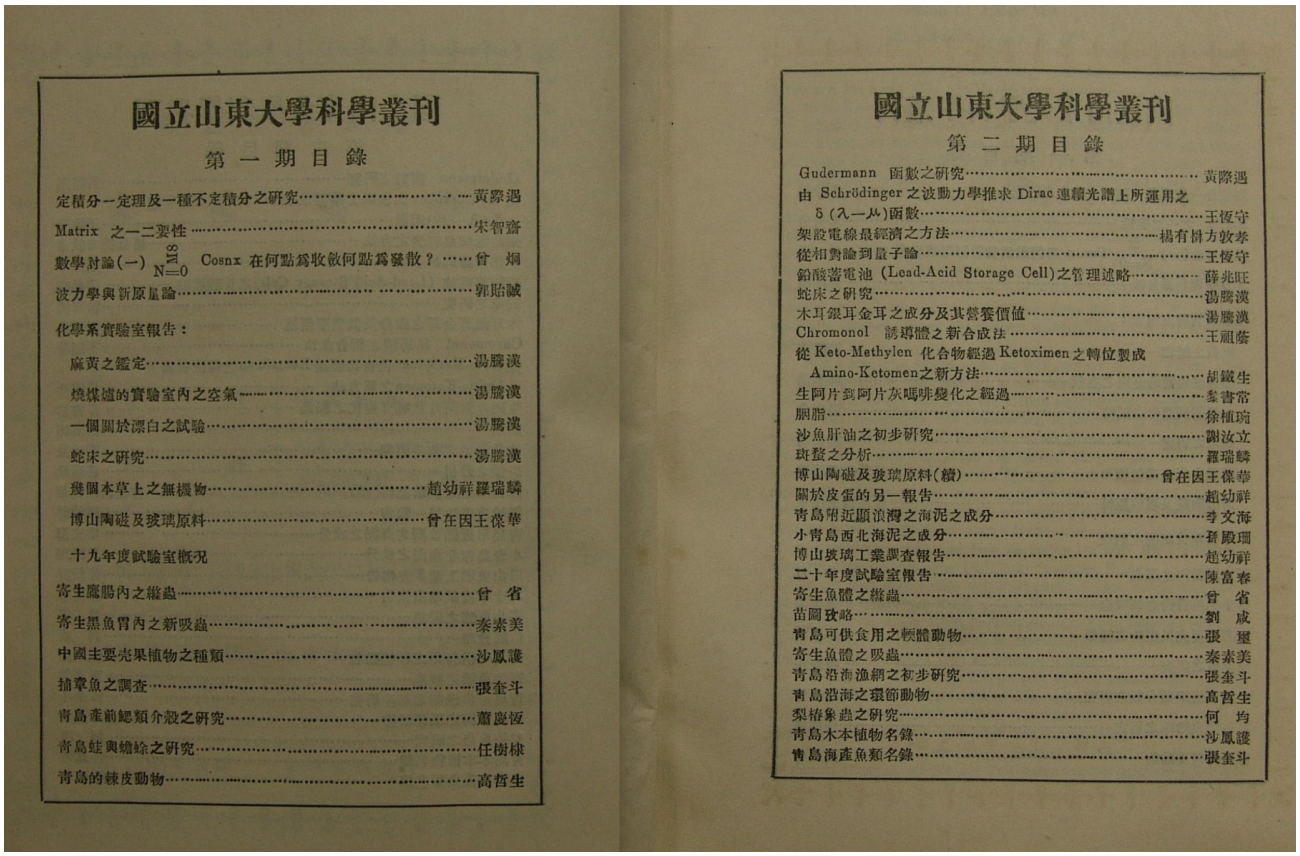
| 姓名 | 別號 | 籍貫 | 履歷 | 職務 | 任職年月 |
|---|---|---|---|---|---|
| 趙畸 | 太侔 | 山東 | 北平國立藝專教授北大講師國立青島大學教授教務長 | 校長 | 二十一年十月 |
| 皮松雲 | 達吾 | 湖北枝江 | 美國芝加哥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畢業英國倫敦大學研究武昌商科大學教務長山東教育廳教育經費稽核委員會主任 | 祕書長 | 二十三年一月 |
| 杜光塤 | 毅伯 | 山東聊城 |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碩士 | 教務長 | 二十一年十月 |
| 黃際遇 | 任初 | 廣東澄海 | 日本高師畢業美國芝加哥大學碩士天津高工武昌師大廣州中大教授河南中山大學校長河南教育廳廳長 | 文理學院院長 | 十九年五月 |
| 宋君復 | | 浙江紹興 | 美國可培大學理科學士春田大學體專畢業滬大體育主任東北大學教授北平師大講師 | 體育部主任 | 二十一年九月 |
| 胡鳴盛 | 文玉 | 湖北應城 | 國立北京大學畢業國立北平圖書館敦煌寫本佛典編輯委員 | 圖書館主任 | 二十四年八月 |
| 張紫雛 | | 山東昌邑 | 國立北京大學中國文學系畢業青島市立中學校長中國國民黨青島特別市執行委員 | 註冊課主任 | 二十三年八月 |
| 鄧初 | 仲純 | 安徽懷寧 | 日本千葉醫科大學醫學士 | 校醫室主任 | 十九年八月 |
| 劉本釗 | 康甫 | 山東 | 國立清華大學會計主任 | 會計課主任兼出版課主任 | 二十年五月 |

職教員錄 一

1933年12月印制的《国立山东大学职教员录》（部分）。其中对任初先生的介绍为：“姓名：黄际遇；别号：任初；籍贯：广东澄海；履历：日本高师毕业，美国芝加哥大学硕士，天津高工、武昌师大、广州中大教授，河南中山大学校长，河南教育厅厅长；职务：文理学院院长；任职年月：十九年五月（1930年5月）”

除了争取外来人才，任初先生还注重自己培养。1932年，任初先生认识了大学刚毕业在青岛胶济铁路中学任教的刘书琴（1909-1994），因其好学上进，任初先生特意安排他到山东大学数理学会做一次讲演，题目就是“数学的定义”。1933年11月，山东大学纪念徐光启逝世三百周年举行学术报告会时，任初先生安排新到任的讲师杨善基（1904-1966）讲“几何学的分类”。[6] 而对于这类为启用新人特别安排的特别讲演，任初先生更是多方搜集材料提供给讲演者，并进行具体的指导，以使青年教师能够通过这种锻炼有所提高，而这对学校的师资培养也是大有裨益。

在解决数学系师资燃眉之急的同时，任初先生在课程编制方面也不遗余力，坚持“内容力求充实，并注重习题演习”，经过几年的卓绝努力，至



國立山東大學科學叢刊

第一期目錄

定積分一定理及一種不定積分之研究……黃際遇
Matrix 之一二要性……宋智齋
數學討論(一) $\sum_{N=0}^{M8}$ Cosnx 在何點爲收斂何點爲發散？……曾 炯
波力學與新原量論……郭貽誠
化學系實驗室報告：
麻黃之鑑定……湯騰漢
燒煤爐的實驗室內之空氣……湯騰漢
一個關於漂白之試驗……湯騰漢
蛇床之研究……湯騰漢
幾個本草上之無機物……趙幼祥 羅瑞麟
博山陶磁及玻璃原料……曾在因 王葆華
十九年度試驗室概況
寄生鷹腸內之繦蟲……曾 省
寄生黑魚胃內之新吸蟲……秦素美
中國主要壳果植物之種類……沙鳳騫
抽章魚之調查……張奎斗
青島產前鰓類介殼之研究……蕭慶恆
青島蛙與蟾蜍之研究……任樹棣
青島的棘皮動物……高哲生

國立山東大學科學叢刊

第二期目錄

Gudermann 函數之研究……黃際遇
由 Schrödinger 之波動力學推求 Dirac 連續光譜上所運用之 δ(λ—μ)函數……王恆守
架設電線最經濟之方法……楊有恪 力敦孝
從相對論到量子論……王恆守
鉛酸蓄電池 (Lead-Acid Storage Cell)之管理述略……薛兆旺
蛇床之研究……湯騰漢
木耳銀耳金耳之成分及其營養價值……湯騰漢
Chromonol 誘導體之新合成法……王祖蔭
從 Keto-Methylen 化合物經過 Ketoximen 之轉位製成 Amino-Ketomen之新方法……胡鐵生
生阿片到阿片灰嗎啡變化之經過……秦書常
胭脂……徐植瑞
沙魚肝油之初步研究……謝汝立
斑蝥之分析……羅瑞麟
博山陶磁及玻璃原料(續)……曾在因 王葆華
關於皮蛋的另一報告……趙幼祥
青島附近頭浪灣之海泥之成分……李文海
小青島西北海泥之成分……蔡殿珊
博山玻璃工業調查報告……趙幼祥
二十年度試驗室報告……陳富泰
寄生魚體之繦蟲……曾 省
苗圃攷略……劉 成
青島可供食用之軟體動物……張 璽
寄生魚體之吸蟲……秦素美
青島沿海漁網之初步研究……張奎斗
青島沿海之環節動物……高哲生
梨椿象蟲之研究……何 均
青島木本植物名錄……沙鳳騫
青島海產魚類名錄……張奎斗

任初先生于 1934 年完成了《定积分一定理及一种不定积分之研究》、《Gudermann 函数之研究》两篇重要的学术文章，发表于《科学丛刊》杂志的第一、二期

任初先生离开前的 1936 年，当时的山东大学数学系已经开设了包括 15 门必修课、22 门分组必修课以及 13 门选修课在内的共计 50 门课程，山东大学数学系迎来了自其建立以来的第一个鼎盛时期。

## 笔参造化，学究天人 [7]

任初先生以数学立身，兼治文史，曾言文科与哲学密切相关，而哲学则以自然科学为基础，故文理必须交叉。倘若文理老死不相往来，则科学发展与人才培育无望矣！任初先生曾谓学问有“平面”与“直线”类型之别，“平面之学问”为“泛滥各科，以求广博”，“直线之学问”为“设为专题，极深研几”。在其看来，达于极致，学问皆可相通，因而做学问自可“设为专题，极深研几”，也可“泛滥各科，以求广博”，然于至高境界，则当兼极“平面学问”之广与“直线学问”之深，方可触类旁通，游刃有余。“或叩以研究纯粹科学有何用处，则曰：‘科学家殚毕生精力，能于书末索引，占一姓字，斯足矣。’”[2]

任初先生既是这么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山东大学执教期间，任初先生于 1934 年完成了《定积分一定理及一种不定积分之研究》、《Gudermann 函数之研究》两篇重要的学术文章，并发表于《科学丛刊》杂志，另有《群论》、《数论》等也陆续发表。同年，其论著《潮州八音误读表说》[8] 也发表于《山东大学文史丛刊》第一期，并出版了《班书字说》。其文理成果兼备的学问修养，即便与整个民国时代那些辉映后世的大师们相比，也不遑多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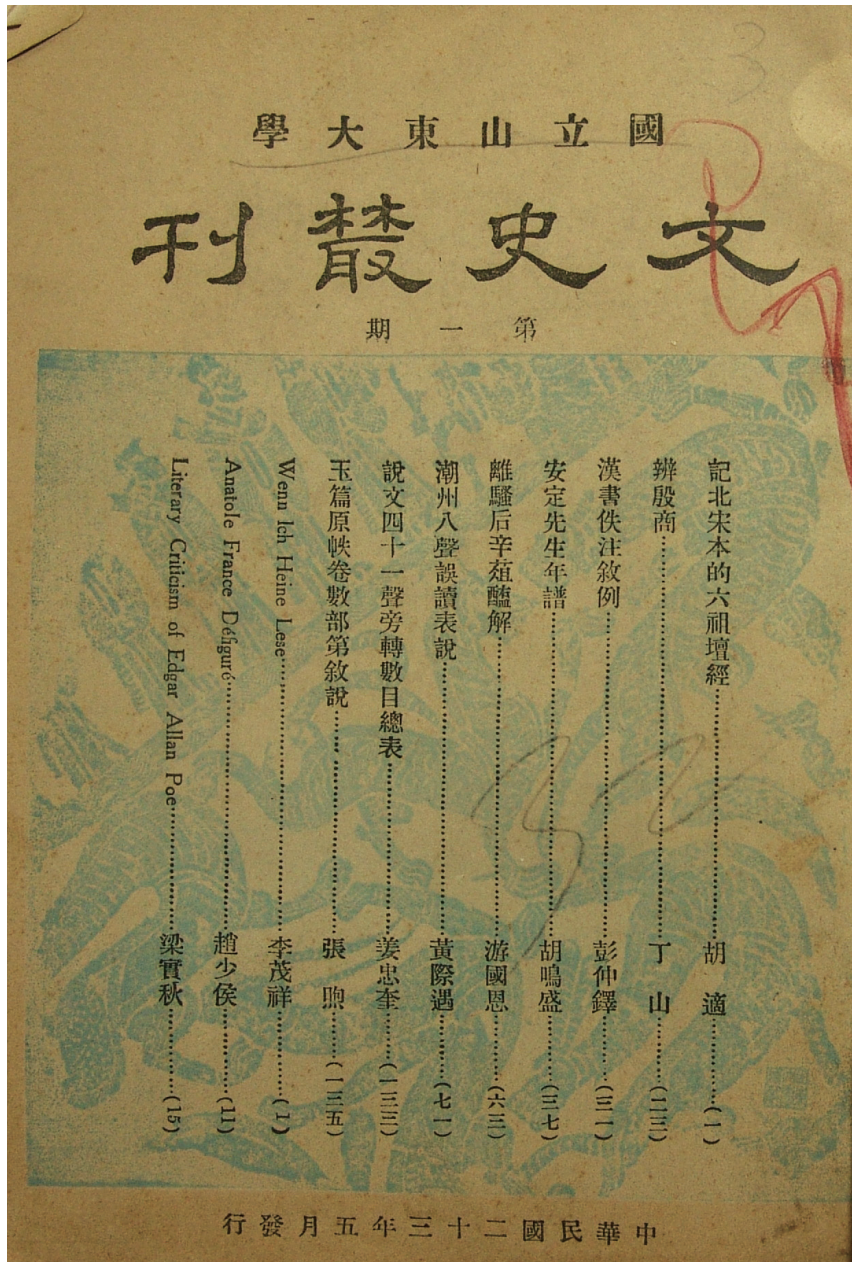
身为文理学院院长的任初先生对于文科学科的建设非常用心。他曾于 1935 年邀请当时的国学泰斗章太炎先生前来山东大学讲学，而个性独特的章太炎之所以能够答应任初先生的邀请，一方面是因为任初先生的才具，另一方面则源于二人在日本时就已建立的私交。1903 年 8 月，十八岁的任初先生由广东省官派赴日本留学，从其治小学。此“小学”绝非是如今九年义务教育体系的初级阶段，简而言之，是国学研究中对于“古汉语文字学”的一个统称，大致分为“音韵、文字、训诂”三类。任初先生对此学问兴趣

甚浓，并由此打下了坚实的骈文功底，而章太炎也对任初先生极为欣赏。

章太炎为浙江人，一口地道的吴语使得两人最初的交流有些障碍，但随着交往日深，任初先生在国学大有进益的同时，顺便也学到了一门方言。也正因如此，当章太炎赴山东大学讲学时，任初先生一直陪同。一是出于师生之谊，二来章浓重的吴语对绝大多数北方的师生而言不啻一门外语，任初先生全程的“同声传译”还是很有必要的。忽然忆起前时曾见报道，一夫妇节衣缩食自费送其子赴美留学，然其子却在唐人街附近一住三四年，回国后英语水平未见长进，倒是练就了一口流利的广东话，可笑可怜可叹！

当然，上述仅为现在家长盲目送子女出国留学的一个特例，并无所指，我们还是言归正传。任初先生学习吴语只能算是“顺手牵羊”，但从中也可见其语言天赋及好学精神。身为数学家的任初先生，其语言学著作也颇丰，前述其著《潮州八音误读表说》算得上其中的代表著作。任初先生根据陈氏《切韵考》的理论，首次为自己家乡的潮州方言考证了“声类切母”与“韵类字首”各八声，并论证出潮州方言乃源于“上古音”的结论。

另一部著作《班书字说》[9] 以章太炎《文始》和《国故论衡》为基础，又独辟蹊径，在“六书”理论、文字构造以及训诂疑难等方面均有独到的见解，然书成后却并未付梓。此种情况在任初先生而言并非孤例。先生“在汴梁时，尝为周亮工栎园做年谱，未敢自信，今犹在箧中。”[10] 从中不难想见任初先生对学问的精益求精。著名语言学家黄家教先生是任初先生次子，毕业于中山大学文学院，是我国语言学大师王力先生的开门弟子，称得上是中国语言学方面的大家，但每遇有人称赞时都会说，“我比起家父来差远了”，并一再强调此实非自谦，从中也可见任初先生语言学造诣之深。


國立山東大學

文史叢刊

第一期

記北宋本的六祖壇經……胡適……(一)
辨殷商……丁山……(二三)
漢書佚注敘例……彭仲鐸……(三一)
安定先生年譜……胡鳴盛……(三七)
離騷后辛葅醢解……游國恩……(六三)
潮州八聲誤讀表說……黃際遇……(七一)
說文四十一聲旁轉數目總表……姜忠奎……(一三三)
玉篇原帙卷數部第敘說……張煦……(一三五)
Wenn Ich Heine Lese……李茂祥……(一)
Anatole France Défiguré……趙少侯……(二)
Literary Criticism of Edgar Allan Poe……梁實秋……(15)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五月發行

任初先生于 1934 年完成的论著《潮州八音误读表说》，发表于《文史丛刊》杂志第一期，篇幅从第 71 页至第 132 页，长达 62 页

先生不仅精研中国古文字学，在日本留学期间还掌握了日语、德语以及英语，并运用自如，这在先生的文章与日记中多有体现。

除邀请诸如章太炎等来校讲学外，任初先生还修书数封力邀黄侃（字季刚，1886-1935）到校执教。与季刚先生的交往也源于任初先生留学日本时期，两人曾一道问学于章太炎先生，且年龄相若（任初先生年长一岁），均嗜美食，皆为兴之所至可放浪形骸于外者，对白话文都不太感兴趣。但最为重要的是，二人皆国学精深，畅谈之下，顿生相见恨晚之情，由此成为

至交。这从其往来书信也可见一斑。在任初先生的一封《致黄季刚书》中言道："……祭酒赵君，深致心折，属为传语，以当先容。黉舍环山，士风椎朴，乏先觉牖我后生。国学鳣堂，尤希清响。愿虚讲席，祗迓教鞭。奚啻嘤嘤之鸣，聊致喈喈之意。庶几曲阜坠绪，高密余风，幸籍心传，平添掌故耳。"相信一般人读罢，恐怕会有不知所云之感。全文虽短，但几乎句句有典。而这不仅仅是任初先生留日时师从章太炎先生的结果，更与从年少时就打下的国学基础有莫大的关系。

任初先生年少时就表现得聪颖异常，才思敏捷，曾自述"臣受父经，云方五龄。礼传章句，甫龀而毕。"[11]十三岁时，就以院试一等的成绩考取秀才，在同科诸生中最为年幼，被誉为"神童"，深受当时的广东学政张百熙赏识，特赠范晔的《后汉书》一部，褒掖有加。这件事对任初先生的影响很大，以至于直到其晚年行文，仍喜欢用《后汉书》的风格及典故。上述书信中提到的"鳣堂"等典故就出自《后汉书·杨震传》："后有冠雀衔三鳣鱼，飞集讲堂前，都讲取鱼进曰：'蛇鳣者，卿大夫服之象也。数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后世因此称讲学之所为"鳣堂"。仅举一例，先生文采之盛，诚意之笃可见一斑。正如季刚先生收到来信后所言"得任初书，甚殷勤可感。"[12]无奈季刚先生一直抱恙在身，终未能成行。

任初先生文理兼长，既讲数理课也上文学课。其中丁观海（我国著名土木工程学家。1930年考入国立青岛大学中国文学系，学号为23230。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丁肇中先生之父）、臧克家都曾修读任初先生主讲的中文系课程。[13]任初先生口才极好，教数学，能把枯燥的公式原理讲得生动活泼，学生不但听不厌，还觉有趣。讲授古典文学，更能旁征博引，妙趣横生。如遇上自己喜爱的名篇，就用一种既

任初先生三十余岁照片，原载于1919年版《国立武昌高师己未级同学录》（此图片由潮汕文化研究中心提供）

非普通话，也非潮州话，更不像广州白话，腔调近似汉剧道白，名曰"孔子正"的诵读腔调歌吟朗诵。任初先生上课声音洪亮，声情并茂，常博得学生阵阵掌声，更有的还在堂下喝彩叫好。对此任初先生却并不买账，总道："我是在讲书，不是来唱戏，无劳喝彩。你们是在课堂听课，不是上戏院听戏，请安静毋噪。"

寻才治学之余，身为理学院院长的任初先生对学校校务及数学学科的发展也颇为经心。1932年，学校经费紧张之际，校长、教务长分赴宁、沪筹措资金，任初先生暂代校务，努力维持学校的正常运转。1933年4月，任初先生参加了旨在"集全国数学专家于一堂，商讨发展科学教育之实际有效方案"的天文数学和物理讨论会。针对学生毕业后的就业问题，任初先生力促成立山东大学职业指导委员会，该委员会于1935年3月正式成立，任初先生为五位委员之一。同年7月，任初先生赴上海参加中国数学会成立大会，并被选为中国数学会董事会九名董事之一。作为时至今日中国数学工作者最为重要的学术性组织之一，任初先生为其创立与发展贡献良多。

## 兼资文武，雅有筹算[14]

任初先生的课在当时校园里是一道别致的风景，仅从装束而言就很吸引眼球。先生平时喜穿长衫，不同之处在于其长衫胸口处缝有两个特制的口袋，一狭长、一短宽，据先生讲，只是取其方便。至于所装之物，可就众说纷纭了：一说是粉笔与钢笔，一说是粉笔与眼镜，一说是钢笔与烟盒，还有一说是钢笔与飞镖。最后一说显然更为给力，颇具传奇色彩，虽不能尽信，却也并非全然无稽。

单就外表论，任初先生也并不像是一温婉书生，其"精力充溢，体貌俊伟似齐鲁人"[2]——莫非这也是任初先生钟情于于山东大学的一个原因？任初先生年少时就热爱体育运动，以骑射功夫名闻乡里。在日本留学期间曾热衷于击剑，并在比赛中获奖。利用假期回乡探亲的时间，先生经常向当地民众宣传体育健身的道理，并创制体育课，亲身示范骑马、击剑乃至球类运动，希冀以此能够先从体质上帮助乡里民众洗刷"东亚病夫"的耻辱身份。据说在此期间，任初先生还主持了澄海开县以来的第一届全县运动会。

任初先生还是第一个将自行车推广到粤东地区的人。先生对自行车可谓情有独钟，既将其作为交通工具，也将其视为运动器械。在任河南省教育厅厅长兼河南大学校长（1929-1930）时，任初先生几乎每天都要在政府与学校两机构间往来办公，政府专门为他准备了一辆汽车，并配备了一名专职司机听候使唤，但任初先生直到辞职也没有使用

过这辆汽车，而是每天骑着自行车穿梭于政府与学校间。这既非政治作秀（中国的政治环境下实无此必要），也不是想替纳税人省钱（这种思想觉悟在当时中国尚未见端倪），任初先生只是认为骑自行车代步方便自由且可锻炼身体，一举两得。不过自民国以降，无论出于什么原因，能够像任初先生那样坚持骑自行车往来办公、上班下班的厅级官员还真是凤毛麟角。[15]

据说任初先生足球也踢得不错，早年留学日本学习数学时，任初先生曾一度是所在学校的足球队长，当时校足球队成员中的中国留学生只有他一人，其余都是日本人。由于训练得法，任初先生率领的这支足球队成绩一直很好。在执教山东大学期间，已过不惑之年的任初先生虽不能与青年学生在球场上一较高下，但却是学校足球赛执法裁判的首选，眼明手快，满场飞奔，仅就体力而言，丝毫不逊于那些年轻后生。即便在平日里，任初先生给人的印象也是“布衣敝履，健步如飞，终日无倦容。体魁硕，年逾六十，壮如四五十岁人”。[16]

这样一个喜好运动、身负武功且率性而为之人，即便随身带几支镖也属“情理之中”吧。

然而学者毕竟是学者，与单纯的体能运动相比，任初先生更痴迷于中国传统的“脑力运动”——中国象棋。任初先生一生酷爱象棋，晚饭后即便稍有空闲，他也会摆好棋盘一人独弈一番，每有所得辄记，然后夹在一本本早已写满本人评注的棋书中。若是能遇一棋力相当者与之对弈数盘，任初先生会兴奋许久。对弈后，任初先生仅凭记忆即可复盘，对两人的着法进行反复演算，分析胜负关键并保存记录。对于自认为好的对局，先生在得意之余往往会标注“名局”字样，并附上自己的评注。虽不无自诩之嫌，然其痴迷程度亦可见一斑。

任初先生的棋艺虽称不上登峰造极，但据说已可居一流棋手之列。当年象棋运动的权威报纸《象棋报》曾登载过先生的一个对局，当时的名手卢辉曾评价道：“此局纯为名作，一等之选也。”

先生与众多象棋名家私交甚笃，经常在一起交流甚至对弈，特别是在为躲避战火避居香港的两年时间里，因参加了许多高质量的棋艺活动，使得任初先生的棋力大增。任初先生最爱在名手对局现场记录着法，只要有余暇就会出现在象棋名手比赛场所，甚至邀请名手至家切磋。当年华南名手卢辉、方绍钦、吴兆平三人常聚集在任初先生家日夜演练双马局，任初先生记录他们的对局达三四册之多，因此其饶单双马的技艺很是高明。而每遇此类场合，任初先生往往身穿他独创的带口袋的玄色长袍，并且随身携带两种烟，好的款待别人，次等的自己吸用，这也成为当时象棋名手对局棋盘旁边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任初先生曾被冠以“超级棋迷”的称号。当年，名棋手周德裕与董文渊在香港作十局赛，先生应邀作棋证。董连胜五局，第六局周悔着，发生争吵，先生始终在场，对其中细节一清二楚。在坪石时，教职员学生闻名登门求弈，不论老少，先生必欣然出秤接待。一夜，一袁姓讲师来与先生对弈，中夜辞去。先生就寝未及半小时，忽然袁来叩门，提出若某着变用他着则可获胜。于是挑灯重整旗鼓，反复变着，最后均失败。此时已凌晨三点，先生始终棋兴高涨，毫无倦容。[17]

晚年时，任初先生将其象棋记录及其评注手订《畴盦坐隐》五十卷，可惜因战乱未能流传下来。然可庆幸的是，任初先生有记日记的习惯，即便是象棋棋局也多抄录于内，细细翻阅从中可见诸多手谈佳品。

##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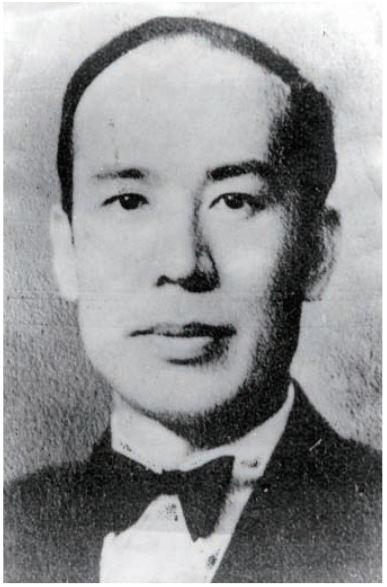
青岛，无疑是一个宜居之地。缺少深厚的文化底蕴是其短板，然背山面海，气候宜人，加之物产丰富，尤盛产海鲜，当时的山东大学选址于此，想来正可耗其物产之有余以补其文化之不足吧。而任初先生在此精于治学的同时，也不忘偶尔去享受一下生活。

在山东大学期间，任初先生与杨振声、闻一多、梁实秋等人意气相投，教学之余时常在一起饮酒作乐。当时的山东大学曾流传有“酒中八仙”的逸闻，此八人于1930年至1932年间在校共事，“宴饮作乐，酒酣耳熟，一时忘形，乃比附前贤，戏以八仙自况”。所谓“比附前贤”，倒不是说此八人将自己比作传说中那“过海”的八位神仙，其“攀比”的对象是杜甫“饮中八仙歌”[19] 中那八位醉态可掬的文士。只是杜甫的“饮中八仙”实际并未在一起饮过酒，是杜甫本人通过诗歌将他们强行拉郎配，而本文所说的这“酒中八仙”倒是时常在一起以酒会友，把酒言欢。

其实最初这群酒仙的成员并不固定，几年之中屡有变化，只是在一次聚饮中间，闻一多先生环顾座上共有八人，一时兴起言道：“我们是酒中八仙！”孰料竟成固定称谓。当时这八个人是：杨振声、赵畸、闻一多、梁实秋、陈命凡、刘本釗、方令孺女士以及任初先生。按照梁实秋先生的说法，他们这八仙“只是沈湎曲蘖的凡人，既无仙风道骨，也不会白日飞升，不过大都端起酒盘举重若轻，三斤多酒下肚尚能不及于乱而已。”而“（任初）先生实其中佼佼者。”[20]

此八仙性情各异。

杨振声，字今甫，山东蓬莱人，为国立青岛大学的实际创办者。就身材而言，为典型的山东大汉，但言谈举止温文尔雅，“居恒一袭长衫，手



1930 年国立青岛大学建校后的第一任校长杨振声（左）及第二任校长赵太侔（右）

携竹杖，意态潇然。”可一旦群友毕集，酒杯在手，则意气风发。今甫先生嗜拇战——类似于我们今天的划拳，“入席之后，往往率先打通关一道，音容并茂，咄咄逼人。”[21]

作为今甫先生的左膀右臂，时任学校教务长的赵畸（字太侔）与时任学校秘书长的陈命凡（字季超）可谓是性格截然不同的两个极端。太侔先生和今甫先生是同学，最大特点就是寡言笑，据说可以和客人相对很久而一言不发。平日专于韬光养晦，乃至于自己原籍何处都讳莫如深。今甫先生因当时的国民政府拖欠经费问题辞职后，太侔先生代其为校长。而季超先生为人开朗豪爽，精明强干，喜动不喜静。基本上太侔先生的所有性格指数乘以 -1 就是季超先生的写照了。当然，两人也有共同之处——都是山东人，都有山东人的酒量。

“八仙”中也有不善饮者，闻一多与梁实秋两位先生从来都是饮少辄醉的，但二人皆好酒，与人对饮时都兴致极高。一多先生早年经历丰富，曾学习油画，并出国游历，后终觉因文化背景差异，中国人在油画方面难与西方人一争短长而主动放弃，从此醉心于文学。据说又因恋情受挫，不忍回顾当时所写的白话情诗而终埋首于故纸堆中专心研究国学。曾言道：“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传闻一多先生一次醉酒，冷风一吹，竟昏倒在尿池旁，一时成为诸仙欢饮时活跃气氛的谈资。与闻一多先生相比，梁实秋先生的早年经历可谓是顺风顺水。生于西子湖畔，顺利考学出国，文学创作使其少年成名，家有贤妻从而生活美满，真是羡煞众人。

酒桌之上最重“酒品”，“酒中八仙”的酒品自然不低，但要优中选优，还要推刘康甫先生。刘康甫先生名本钊，时为国立青岛大学会计主任，为人细致谨慎。好酒程度不亚于闻、梁，而酒量之豪可直追赵、陈。嗜拇战，只因耳聋严重，拇战时不易控制声音大小，故声音极高，而对于对方的呼声却不甚了了，但“只消示意令饮，他即听命倾杯”，从不疑对方有诈，其酒品颇有君子之风。

方令孺是八仙中唯一的女性，安徽桐城人，教国文，兼管女生工作。“有咏雪才，惜遇人不淑”，一直过着独身生活。她一向是一袭黑色旗袍，极少的时候薄施脂粉，给人一种恬淡朴素的印象。虽参加欢饮，但从不纵酒，刚要“朱颜酡些”的时候就停杯了。

“八仙”中最为豪气干云者，还得说是任初先生。“友朋饮宴之间，尤其是略有酒意之后，他的豪气大发，谈笑风生。他知道的笑话最多，晕素俱全，在座的人无不绝倒，甚至于喷饭。……每当嘉会，酒阑兴发，击箸而歌，声震屋瓦，激昂慷慨，有古燕赵豪士风。”[22] 任初先生尤嗜拇战，“宴会时拇战兴致最豪，嗓音尖锐而常出怪声，狂态可掬。”[21] 一次微醺之后，任初先生口占一联：“酒压胶济一带，拳打南北二京。”虽纯为戏言，但其豪气可见一斑。

诸“仙”经常聚饮的地点有两个：鲁菜馆顺兴楼与豫菜馆厚德福。顺兴楼是青岛本地的老馆子，手艺属于烟台一派，当时最拿手的几样菜如爆双脆、锅烧鸡、酱汁鱼、烩鸡皮、拌鸭掌、氽西施舌、黄鱼水饺等驰名胶东。厚德福则是北平厚德福饭庄在青岛的分号，自有一套拿手绝活儿，如瓦块鱼、鱿鱼卷、铁锅蛋、核桃腰、红烧猴头、琵琶燕菜、清炒亦或黄焖鳝鱼……都是独门手艺，而其焖炉烤鸭也是别有风味。[21]

这群酒仙对于菜品的好坏固然看重，但最注重的还是酒的品质。“八仙”们每次聚会以喝尽一坛花雕为限。一坛酒约三十斤，雇两个工人抬到店，当面启封试尝，若微酸倒尚无大碍，最忌的是带有甜意，有时要换两三坛才中意。当然，这只是诸位“饮君子”们口味刁钻而已，却不是摆谱。一旦酒菜上桌，诸人皆喜欢自行舀取，以为那样才尽兴。他们喜欢用酒碗，一口一大碗，痛快淋漓，对于菜肴反倒不大挑剔，通常是一桌整席——也就

从左至右：闻一多，梁实秋，方令孺女士

是今天我们常说的标准套菜，但是偶尔也别出心裁，例如：上菜一般先是以四个双拼冷盘开始，诸仙有一次要求将其换成二十四个小盘，把圆桌面摆得满满的，且要求精致美观。有时候，尤其是在夏天，则将四拼盘换为一大盘，把大乌参切成细丝放在冰箱里冷藏，上桌时浇上芝麻酱三合油和大量的蒜泥，据说这一冷荤很受欢迎，比拌粉皮之类的凉菜相比确是高明。一次吃铁锅蛋时，太侔先生建议外加一元钱的美国干酪，切成碎末打搅在内，菜成，果然气味浓郁、不同寻常，从此成为诸仙聚饮时的定例。酒酣饭饱之后，通常要一大碗酸辣鱼汤，用以醒酒。

据说有一次胡适自京赴济，“八仙”设宴为其洗尘。席间“八仙”猜拳豪饮之状，将胡教授吓得忙把刻有“戒酒”二字的戒指戴在手上，并说：“此乃内子所赐，胡某惧内，不敢犯戒。”“八仙”见胡教授如此认真，也就不再勉强。酒后，胡适还曾认真劝诫“八仙”酒多饮无益，回到北京后，还专门就此给“八仙”写了一封信。

适之先生以惧内为由逃酒倒不是托辞，他是真怕老婆！对此适之先生也从不讳言。适之先生有收集国外钱币的嗜好，曾有一友人寄给其十几枚法国硬币，其中一面刻有“PTT”字样，适之先生笑言他原有成立一个“怕太太”协会的打算，此硬币竟然含有协会名称首字母，正可作为“徽章”，直到晚年适之先生对此事仍念念不忘。适之先生与夫人江东秀的结合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结果，婚前自然谈不上有什么感情。等到适之先生遇见其表妹并一见倾心后，便下决心离婚，向包办婚姻宣战，追求属于自己的爱情。可当适之先生将这一决定委婉的说出后，江东秀立刻抄起一把刀并拉过两个儿子，威胁道：“离婚可以，我先把两个儿子杀了再和你办手续吧！”吓得胡适魂飞魄散，赔罪求饶。从此，再也不敢有离婚的念头。当然，江东秀绝非传统意义上的“母老虎”、“河东狮”，纵观适之先生一生，江的坚强、隐忍、细致也使适之先受益良多。仅就此事而言，江的坚持客观上毕竟阻止了一场近亲结婚的错误，善莫大焉。

其实，纵观古今中外，“惧内”并非特殊的社会现象，更与男人的勇气、智慧等等无关。比如戚继光，“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连眼都不眨，但在家中却是畏妻如虎；古希腊先贤苏格拉底在其妻的淫威下渡过了一生，并总结了这样一条“哲理”——假如你的妻子是善良的，你便是一个幸运儿；假如你的妻子是邪恶的，你就会成为哲学家。

像这样的“惧内”名人很多，无需细细搜罗即可编成一部鸿篇巨制，咱们还是言归正传，抛开“妻管严”继续说说仙家们吧。“八仙”宴饮后，往往尚有余兴，通常就在任初先生的带领下乘着月色与酒兴蹒跚而至某家潮汕籍的店铺，做一回半夜敲门的不速之客。当时在青岛颇有几家潮汕巨贾以经营鲁、粤两地土产为业，且皆对任初先生礼敬有加。一众平素端庄斯文的知识分子，满身酒气浩浩荡荡的在深更半夜敲店门，足以令店内睡眼惺忪的伙计睡意全消。进店后，任初先生熟门熟路的带领诸人直趋后

中国海洋大学“一多楼”，为一栋二层建筑。任初先生在山东大学执教期间住在此楼二层，闻一多先生住在一层

厅，主人的款待热情而周到，烹茶、烧烟皆有清秀的小童在一旁伺候。潮汕一带对饮茶一直十分讲究，皆饮功夫茶，虽身处异地也断不入乡随俗。其所用茶具小而精致，冲泡极有功夫。以红泥小火炉烧炭火煮水，浇灌茶具，冲入香茗，用小盅奉客。几盅吃下，余香满口而酒意全消。任初先生本人也很懂得吃茶，但不常喝。待客“起码是‘大红袍’、‘水仙’之类”，因此任初先生在山东大学期间的好友如梁实秋、闻一多等经常去他那里“蹭茶”吃。任初先生经常向来蹭茶的诸友就茶叶、茶具、水质、水温乃至如何品茶详加分析，如谓炉火与茶具相距以七步为度，沸水之温度方合标准等等。及至潮汕店铺中，任初先生再三告诫诸人，举小盅饮功夫茶，若饮罢径自返盅于盘，则主人不悦，须举盅至鼻头猛嗅两下方可。不知现在喝功夫茶是否还有此讲究，想来是以此表明留恋茶香，以示对主人佳茗待客的感谢之意吧。

茶罢，店主人将一众“仙长”们迎进内厅，点一灯如豆，短笛长箫信口吹，荒腔走板亦无妨，只图一乐。待得酒意消退，纷纷起身称谢告辞，店主人往往还有一匣香茗见赠。[23]

这“八仙”不仅喜欢酒后夜游，对于结伴野游也兴趣颇浓，再加上青岛风光秀美，更增游兴。任初先生在其日记中就不止一次的记载与闻一多、方令孺等结伴游崂山的经历。

对于平时的饮食，任初先生也较考究，曾自带一潮汕厨子为其做饭。这倒不是因其富裕或为了摆谱，只怪南北饮食差异太大。一次，任初先生从家乡回来，立刻邀梁实秋与闻一多去他的住所吃饭，一桌子菜以海鲜为主，梁实秋先生后来回忆“都鲜美异常”。其中有一碗白水氽虾，十来只明虾去头去壳留尾，滚水中一烫，经适当的火候出锅上桌，肉白尾红，蘸酱油食之，脆嫩无比。这种简单而高明的吃法，使梁实秋等大为赞叹，以后常仿此菜式待客，而但凡吃这道菜的无不称善。但任初先生此次请客的另一道“硬菜”——清汤牛鞭，可让闻、梁两位书生犯了难。只见清汤中一白汪汪之物漂在面上，任初先生虽殷勤劝客，并再三强调其滋补之效，但客人却均不敢下箸。想来这也是当时南北饮食差异的一种具体体现吧。倒是任初先生刚从汕头携来的一篓潮州蜜柑，在饭后让宾主们一扫而空，小补了牛鞭之缺。请朋友吃饭，任初先生大有倾其所有的架势，对于平时的饮食任初先生倒是要求的很简单，一碗汤，两个小菜即可。若有不速之客登门，则不过加两个荷包蛋而已。

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形势混乱，任初先生及其友人虽偶尔寄情于酒宴欢会，乃至乘醉夜游，中间也不

免透出颇多无奈。浮生难得半日闲，与友人觥筹交错之际，暂时抛却诸般烦恼，疏放各自性情，一吐胸中块垒，亦是件大乐事。然终有宴罢曲终之时，“八仙”如此相聚并未几年便作风流云散。

**未完待续**

本文的写作得到了山东大学数学院院长刘建亚教授的大力支持，四川大学数学学院罗懋康教授多次给予了细致的指点，潮汕文化研究中心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在此一并致谢！

作者介绍：

东青（1981-），文学博士，现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数学文化》文字编辑。

## 参考文献

1. 吴定宇主编：《走进中大》，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 页。

2. 饶宗颐：《黄际遇教授传》，原载《暹罗澄海同乡会成立周年纪念刊》，泰国曼谷 1949 年，第 35 页。

3.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语出《左传·宣公十二年》。

4. 从字面理解，畴盦即是“研究数学的地方”，语出清代阮元著《畴人传》。关于何为“畴人”，其含义不一，根据《史记集解》对《历书》“畴人”的注释“家业世世相传为畴。……各从其父学”的说法，认为中国古代天文学家和数学家多是师承家学，所以称为畴人。

5.《山东大学校史》，山东大学出版社 1986 年 4 月第 1 版，第 70 页。

6.《黄际遇日记（节本）》，1932 年 12 月 14 日；1933 年 3 月 9 日，3 月 21 日，11 月 17 日，11 月 24 日。

7. “笔参造化，学究天人”，语出李白《与韩荆州书》。

8. 国立山东大学出版委员会：《国立山东大学文史丛刊》，山东大学出版社 1934 年第一期，第 71-132 页。

9. 饶宗颐编：《潮州志·艺文志》“经部”，第 16 页，1965 年香港龙门书店。

10.《万年山中日记》第五册，1932 年 10 月 28 日（农历九月二十九日）。

11. 黄际遇，《万年山中日记第二十七册》序。

12.《黄侃日记》第 878 页，《寄勤閒室日记》，癸酉四月六日，1933 年 4 月 30 日。

13. 李彦英、毋嘉平：《著名校友丁观海》，《山东大学报》2004 年 2 月 28 日。

14. “兼资文武，亚有筹算”，语出《隋书·卷六十·列传第二十五·崔仲方》。

15. 林莲仙：《缅怀黄任初师》，原载《汕头文史·潮汕教育述往》，1991 年第 9 辑，第 172-179 页。

16. 姚梓芳：《澄海黄任初教授墓碑》，载于《黄任初先生文钞》，广州国立中山大学 1949 年版，第 95-96 页。

17. 钟集：《记黄际遇先生》，陈景熙、林伦伦主编《黄际遇先生纪念文集》，汕头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88 页。

18.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语出曹操《短歌行》。

19. 唐代杜甫曾作《饮中八仙歌》，生动描写了贺知章、李琎、李适之、崔宗之、苏晋、李白、张旭、焦遂等八人的酒姿醉态，是杜诗中难得的潇洒之作。

20. 梁实秋:《记黄际遇先生》，载《雅舍杂文》，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第 90 页。

21. 梁实秋:《酒中八仙——忆青岛旧游》，载《雅舍杂文》，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第 42 页。

22. 张云:《<黄任初先生文钞>序》，原载《黄任初先生文钞》，国立中山大学 1949 年。

23. 梁实秋：《喝茶》，载《清华八年》，华夏出版社 2008 年，第 68 页。